

至于脾虚所致而缠绵日久的重症，还须加服健脾益气之剂为好。

山东省莱阳县卫生学校 兰茂璞

薏苡附子散合芍药甘草汤加味 治疗坐骨神经痛有效

读您刊1982年第7期登载的程广里同志治疗坐骨神经痛23例的报道，经重复验证颇有疗效，举例案一则如下：

傅××，男，50岁，干部，1982年8月5日就诊。主诉：两月前因坐骨神经痛，采用中西药治疗效果不显。近日加重，沿右侧腰胯至腿后侧，痠楚疼痛，风雨之日尤甚，伴心烦不宁、头晕失眠。检查：臀中部、臀线、腘窝和小腿沿坐骨神经有触痛点，直腿抬高阳性，踝反射、小腿后侧皮肤触觉均减退，血压140/90毫米汞柱。脉象紧微弦，舌质淡稍紫，苔薄微黄。辨证使用上述原方，药量稍作如下调整：薏苡60克，黑附子10克(先煎)，赤芍20克，甘草3克，党参15克，当归10克，鸡血藤12克，秦艽12克，川牛膝10克，海风藤10克。经服本方五剂，上述症状基本消失，又服五剂病愈，随访至今未见复发。

山西省襄垣县卫生局 孙陆斌

芍药甘草汤治便秘验证

便秘为常见病之一，病因多以阴血亏虚为主。一般以养阴增液润下法治疗，近期疗效虽好，但不久又燥结如初；尤其一些久病重病患者，用益阴润燥则缓不济急，恣用通利又戕伐元气，重竭真阴，而致燥结益甚，真有“医之病病道少”之叹。最近学习了甘肃老中医杨作樸“芍药甘草汤及其加减治疗习惯性便秘”的经验，经重复使用于60多例病人，药专力宏，奏效迅速。现将典型病例和笔者验证的体会介绍于下：

患者杨××，男，61岁，患肺结核三年多，经治疗病情得以控制。但大便秘结，常5~7日一行，颇以为苦。诊见形体消瘦，面色皤白，舌嫩红，脉细数。证属气阴两虚，肠燥便秘，治以益气养阴、敛液通便。处方：白芍35克，甘草12克。药后即便软易解，连服三剂后，大便畅利，每日一行，随访三月依然。又如，李××，男，50岁，某校讲师。患“习惯性便秘”已七年之久，常服润下通便药，疗效不佳，最近又大便四天未解、腹胀满不适，属津亏便秘兼肝胃气滞，处方以芍药甘草汤加麦芽，服后大便即正常，后又将原方自行授与同校患便秘之教职工多人，均

能药到病除。

本法只用生白芍24~40克，生甘草10~15克，水煎服。一般不需加减。通常2~4剂可畅排软便，且不致燥结，无便后复结之虞；若顽固性便秘，每周续服一剂，即可保持大便通畅。杨氏云本法适用于燥热、气滞、阴血虚型之肠燥便秘，对气虚及阴寒凝结无效(参见：杨作樸《临证录》，甘肃人民出版社，1980年版)。但笔者体会，只要适当加味，对此两型效亦甚佳，如气虚者加白术24~32克，阴寒凝滞者加附子10~15克。其他类型便秘，还可参照杨氏治验辨证加减：如阴(血)虚液燥甚者加阿胶9~15克；血虚而偏寒者加当归9~15克；兼气滞者加麦芽10克。血压偏高而肝旺者去甘草加代赭石20~30克；血压高而湿盛者去甘草加半夏、陈皮，若非肝旺湿盛则不去甘草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地区卫生学校 王文士

关于《内经知要》一段引文

明·李念莪在《内经知要·病能》引“调经篇云：因饮食劳倦，损伤脾胃，始受热中，末传寒中。”前贤秦伯未先生在《内经知要浅解》引上文前冠以“灵枢”二字(原书93页)，在“备注”中又写道“‘灵枢’内无此篇名，待考”(原书94页)。

笔者拟完成前贤秦伯未先生留给我们的“待考”任务，通过学习查阅了《灵枢》和《素问》。发现《灵枢》八十一篇名中无“调经篇”，《素问·调经论》中无此文，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诸注本均无此文；可见“因饮食劳倦，损伤脾胃，始受热中，末传寒中”非《内经》原文。

考：李东垣《脾胃论·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》中载有“是饮食劳倦，喜怒不节，始病热中，则可用之。若末传为寒中，则不可用也……今详《内经·针经》热中、寒中之证列于左”，下面即节引了《素问·调经论》的一些文字。李东垣主要是引用《调经论》之文，以论证气虚发热用补中益气汤治疗的道理。所说“《内经·针经》(即《灵枢》)热中、寒中之证”，是指《灵枢》五邪、师传等篇。

李东垣《脾胃论》成书于南宋淳祐九年(1249年)，李念莪《内经知要》成书于明崇祯十五年(1642年)，两书相距三百九十三年。由此推断，李念莪是否误将《脾胃论》之言，当作《素问·调经论》之文，并加以删节(古人在引用文献时，往往会作些删改)，纳入《内经知要》中。

至于“因饮食劳倦，损伤脾胃，始受热中，末传寒中”究竟是否来自《脾胃论》，或另有出处？还希望

对此有兴趣的本刊读者再考。

吉林铁路局吉林中心医院 李育才 初淑华 王玉英

方有执与《伤寒论》

读您刊“关于伤寒‘三纲鼎立’之说”(1983年第5期“园地”),联想起没有方有执的“修言错简”,伤寒学派的争鸣不会那样热烈。可见方有执也是伤寒学派形成和发展中的关键人物之一。

方有执潜心研究《伤寒论》数十年,“涉苦万端,鬓霜而后豁悟”(《伤寒论条辨·序》),于晚年才写出《伤寒论条辨》八卷,“寻求端绪,排比成编,一一推作者之意,为之考订,故名曰《条辨》”(永瑤等撰:《四库全书提要总目》第104卷),这是他一生研究《伤寒论》的结晶。由于他对王叔和、成无己的旧本《伤寒论》,力持错简,首创重订,而使成为明代治伤寒学的著名人物。

自从王叔和整理编次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以后,历代医家基本上按叔和的本子进行研究;但也有人王叔和编次的《伤寒论》有怀疑。如元代王履就曾说:“惜其既以自己之说,混于仲景所言之中,又以杂脉杂病纷纭并载于卷首,故使玉石不分,主客相乱”(丹波元胤:《中国医籍考》第23卷)。不过王履对叔和编次之《伤寒论》,仅仅指出其“相乱”,“以自己之说,混于仲景所言之中”,并未对叔和过多地责怪,基本上持褒贬各半的态度,也未提出需要重新修订。其他注家也“弗置理会”。到了明代,方有执认为其“颠倒错乱殊甚”,要“重考辑”,大谈特谈错简重订之说。他认为《伤寒论》代远年湮,早已失仲景之旧,即是王叔和所编次的,亦为后人所更易,要想彻底地研究《伤寒论》,就必须按照仲景的本来意图,加以考订移整,而返还其本来面目。故他说:“《条辨》者,正叔和故方位,而条还之谓也”(《伤寒论条辨·跋》)。为此,他采取了“削”、“改”、“移”、“调”四种办法加以重订:

一、“削”。方氏认为,通行本《伤寒论》第三篇《伤寒例》,纯系叔和伪造,虽经成无己注释,终非仲景原文,应当首先削去。

二、“改”。方氏对《伤寒论》之“太阳篇”大加改订,分为“卫中风”、“营伤寒”、“营卫俱中伤寒”三篇。凡桂枝汤证及其变证一类的条文,列于“卫中风篇”,共六十六条,二十方。凡麻黄汤证及有“伤寒”二字列于条首的条文,别为“营伤寒篇”,共五十七条,三十二方。凡青龙汤证等有关条文,汇为“营卫俱中伤寒篇”,共三十八条,十八方。以上三篇,分列于一、二、三卷,是《伤寒论条辨》全书的重点。

三、“移”。方氏认为,叔和所撰之《伤寒论》第一篇“辨脉法”和第二篇“平脉法”,虽非仲景原著,但内有仲景的东西,故仍可保留,宜移置于篇后,两篇通叫“辨脉法”,不另分“平脉法”。再“辨痉湿喝病脉证”篇原是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内容,但因《伤寒论》与《金匮要略》重复,虽不宜砍削,也应移于篇后。这三篇共为第七卷。

四、“调”。方氏对其他各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。阳明与少阳二篇为第四卷;太阴、少阴、厥阴三篇为第五卷;温病、风温、杂病、霍乱病、阴阳易差后劳复为第六卷。最后第八卷仍保留了王叔和诸可与不可等篇,以备临症参考。

方氏此举,且不论是否能恢复仲景《伤寒论》原貌,单就他这种敢于疑古,学不墨守的创新精神,却是难能可贵的。在当时医界引起了很大反响,围绕着错简重订,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争鸣,从此拉开了伤寒学派内部派系争鸣的序幕。

有的医家赞赏、追随方有执,形成错简重订派。如明末清初喻嘉言,不但步方有执后尘,亦言“错简重订”之说,激烈批评王叔和、成无己等人,而且对方氏改订的太阳篇又大加发挥,正式倡言“风伤卫,寒伤营,风寒两伤营卫”的三纲鼎立之说,使后世的伤寒家又围绕着方、喻的三纲鼎立说展开了激烈的争鸣。追随方、喻“错简重订”与“三纲鼎立”说的有张石顽、吴仪洛、程郊倩、章虚谷、周扬俊、黄坤载等人。

有的医家则反对、贬斥方有执,维护王叔和、成无己旧本《伤寒论》,提倡宗古编次,形成维护旧论派。如张卿子、张志聪、张令韶、陈修园等均属这一派的中坚人物。

介于这二派之间,另有一派的学者,并不过分追究《伤寒论》的错简与真伪,而着重于研究《伤寒论》辨证论治的规律,形成了辨证论治派。如柯韵伯、徐灵胎、钱天来、尤在泾、包兴言等均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。

由上可见,方有执修言错简、重订伤寒的创举,确是引起了伤寒学派内部的派系争鸣,对伤寒学派的发展和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。由他而掀起了明、清医界进一步深入研究《伤寒论》的第二次高潮(第一次高潮当在宋金时代),使伤寒学派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。总之,首次整理并保存《伤寒论》有功的王叔和,全面注解《伤寒论》的第一家成无己,以及修言错简重订的方有执,他们皆是伤寒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人物无疑。

湖南中医学院 陈大舜